

# “历史社会学”再探讨

——兼与《历史社会学初论》一文商榷

席 来 旺

在我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的今天，开展历史社会学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1期发表吴忠民同志的《历史社会学初论》(以下简称《初论》)，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大胆构想，读后确能使人耳目一新。但是，《初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观点值得商榷，笔者就此提出自己的三点不同意见，以期引起讨论。谬误之处，尚希指正。

## 一、何谓“历史学”

《初论》中“历史社会学”概念的确立，建立在与历史学截然对立的基础之上，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基础加以考察。

《初论》明确指出，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学完全不同。首先，两者所研究对象不同，历史学“要如实地记录历史过程”“凡是发生在以往者，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围，而那些产生在过去并对当今社会有影响者，就属于历史社会学研究的范围了”。<sup>①</sup>其次，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使用的名词术语不同，前者往往使用诸如历史作用、局限性、背景、经验教训等术语，而历史社会学要运用象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角色之类的社会学名词。再次，两者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历史学是对史料的鉴别、校勘、考证，历史社会学则通过统计、社会调查进行研究。

难道历史学只是以“如实地记录历史过程”为最终目标吗？历史学的名词术语永远被封闭在一个固定模式构架之中吗？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对史料的鉴别、校勘和考证吗？答案是否定的。

历史学不同于历史本身，它是史学工作者透过时空的间隔对历史的反求构筑，历史学的发展史表明，任何时代的史学都是时代的直接和间接的反映。诚然，历史是已发生的事，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这些客观存在，可是历史学家都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当代人，他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也参与创造当代的历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时不可能不掺进当代的意识，一个在作为的历史学家是不会满足于停留在对历史的客观描述上，他总是要以史学为武器，对历史进行反思以获得对现实的进步有某种积极意义的东西。中国史学自古以来就具有“鉴往知来”、“通古启今”的特殊功能，大凡卓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把史学当作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

<sup>①</sup> 吴忠民：《历史社会学初论》，《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1期。

《初论》对历史学形象的描绘不能不使人们联想起非常岁月的中国传统史学。历史学研究的内容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极为宏富。应该说在革命烽火年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出于时代的需要不能不以革命和阶级斗争为其主要内容。正因为人们常常注重历史的资政性,却忽略了它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使历史学的形象一度受到歪曲:一部中国古代史被写成儒法斗争史和农民战争史,而无限丰富多彩的世界历史被砍削得只剩下一副革命的框架,愈到近现代涉及面愈狭窄。随之,史学研究的观念变得陈腐落后,似乎越古越有学问,越近越无研究价值,继而相当一部分人自以考据为正宗,满足于对过去历史的解释,往往脱离现实的要求等等。如果说《初论》的“历史学”定义成立的话,也只是反映了这种非常环境中史学的畸形发展。

历史学本身具有鲜明时代性,这是史学得以不断发展万古永新的奥秘所在。自古以来,史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一个史学家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认识的程度,知识的积累和自身的立场来不断丰富研究内容,扩大研究范围,历史学的名词术语与研究方法也随之同步更新。如今时代前进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已从阶级斗争转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我国史学的那种历史特点同时代越来越不相适应。“史学危机”的呼声道出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心声。我国史学正在发生转机,正由封闭状态走向开放,主动吸收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切有益成份,正酝酿着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向更高的科学水平发展。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新兴边缘学科层出不穷,新的学术名词、历史概念不断涌现。例如开展“现代化史学”研究,必须涉及“社会群体”、“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社会变迁”等术语,而一些过时的旧有名词必将被发展中的史学所淘汰。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意识到史学研究变革的紧迫性,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开始引入史学领域,河南大学宋代研究中心“宋代信息资料库”的建立,就是利用电子计算机的一项重大成果。

如果我们再把视野开阔一些,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学发展趋势,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历史学的真实面貌。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导师们所讲的“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sup>①</sup>的名言,也正是从史学本身的特点及其特殊的社会功能这个角度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19世纪的欧洲曾盛行“兰克学派”的资产阶级史学,它以标榜“不偏不倚”、“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科学方法而闻名,兰克把自己的历史著作说成是“完全如实地说明事情的真相”。<sup>②</sup>历史是不能被史学家“完全如实”地说明的,其实兰克本人也并未作到这点。纯客观地说明历史的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而不是最终目标。处于19世纪走向20世纪历史转折时期的克罗齐与兰克相反,他认为:“每一部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sup>③</sup>古治也认为“我们只能以我们今天的心灵去思想过去,在这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sup>④</sup>这些看法比兰克的历史观显然是一大进步。

进入本世纪后,在欧洲史坛影响最大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反对把历史研究局限在狭隘的政治史范围内,而主张研究历史的全貌,包括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以及人类生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②③ 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60页。

④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的各个方面，即所谓“全面的历史”，特别反对孤立地描述以往的历史事件，着重于研究整个“社会结构”。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的“年鉴学派”不断引进自然科学的先进手段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采用了大量新名词，“长（中、短）时段”、“结构”、“局势”等术语充斥史籍论文。50年代以来，法、英、美诸国风行的跨学科研究异军突起，历史学吸收其他学科成果而扩大了自己的领域。60年代美国学者将数量方法引入经济史和政治史领域，统计学原理和电子计算机开始应用于史学研究，比较史学研究重新抬头，而“当代史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历史学的观念及其职能的变化，要求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扩展历史学的研究领域。”<sup>①</sup>口述史学、视像史学等十分活跃，给历史学带来生机和活力。

可以看出，《初论》一文对历史学的描述显然不是历史学的真实面貌。而且，《初论》以此为依据确定的“历史社会学”概念也值得商榷。

## 二、何谓“历史社会学”

究竟什么是“历史社会学”，它到底属于哪一类性质的学科呢？毛泽东同志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sup>②</sup>“历史社会学”源自历史学与社会学二者的有机结合。

我们知道，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而社会学作为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与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无确定说法，但“通常认为是研究社会和社会问题的学科”。<sup>③</sup>如果就历史学与社会学相比较可以看出，“历史学主要是研究过去的事情，社会学则把重点放在研究当代或不久以前发生的事”。<sup>④</sup>但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又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以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这两个学科也是互相借鉴的，历史学的大量资料是社会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根据，历史学的方法是社会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样，社会学知识也是人们从事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社会学的方法正在被历史学大量吸收，以致于形成了历史社会学这一学科。历史社会学犹如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相互交叉、相互结合的产物，它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接点，这种结合与交接并不是简单的凑合，而是一种有机的融合，它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发展，学科分类日益细化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介于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初论》认为：“历史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现存历史因素与当代社会各种现象之间相互关系及其规律的学科”。这种理解似乎过于狭窄。诚然，研究历史发展对于现今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是历史社会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历史社会学又不完全是一门社会学，尽管它涉及到社会现象，运用社会学的一些方法，但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象“历史政治学”、<sup>⑤</sup>“历史地理学”、<sup>⑥</sup>“历史人口学”<sup>⑦</sup>等一样，历史社会学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

① [英]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84页。

③ 见《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2页。

④ 李星万等编著：《社会学基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⑤ 郝铁川：《历史政治学刍议》，《光明日报》1987年8月5日。

⑥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国百科年鉴（198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6页。

⑦ 周达：《历史人口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势》，《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

分支学科,是史学工作者运用社会学的某些方法进行的历史研究。对此,《初论》冠之以“国外的历史社会学定义”而加以全盘否定,这是不妥的。纵然在新学科建立之初一些定义难以确立,但人们对其称呼时还是注重它的内涵的。例如,新兴的军事领导学是“将领导学引入军事学领域的必然结果”,<sup>①</sup>历史政治学、历史地理学、历史人口学的用词与内涵间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换个角度讲,政治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无不是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对某一个具体领域进行研究的分支学科,<sup>②</sup>只是历史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社会学的属性不同一般罢了。不过,为了更完整严谨起见,我们可以避免国外学者的界说,赋予历史社会学学科的含义,它不仅仅“是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资料”,而且是史学工作者运用社会学的某些原理和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一门学科,这里讲的是完整意义上的历史研究。

目前国内还流行着其他一些关于“历史社会学”的说法,笔者也不敢苟同。如有学者认为“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史学与社会的关系”,<sup>③</sup>即史学研究活动本身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例如史学的功能、史学研究受制于社会环境的情况、史学家与读者大众、史学著作及其影响等,实际上是把历史社会学划在科学社会学范畴内历史评论学之列,因为史学评论学的功能就在于沟通作者和读者,在于指出史学成果的优劣,在于衡量一时一地的史学成就,在于督察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得失等等。鉴于目前“科学学”这门“研究科学和科学活动的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影响”<sup>④</sup>新学科的兴起,也有学者认为研究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史学与现实的联系、史学的社会功能、社会政策及背景对史学的影响等等,已属于“历史科学学”的范畴。<sup>⑤</sup>这种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由历史社会学的属性所决定,其研究对象除了历史发展对现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外,还应该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关系、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它们同各种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等等。

历史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笔者认为并非象《初论》所讲的截然对立、阵线分明。二者之间不仅各具特色,而且存在着密切关系。《初论》认为只有历史社会学的重要特征才是“具有现实感”,事实上史学从来就不是远离尘世的佛门经卷,也不是于实无用的书斋摆设。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现代化建设中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都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研究,现代化不仅是现实问题而且是历史问题,现实所提出的新问题往往引起对历史现象的反思,探踪求源,追溯该问题的历史演进过程,从而搞清其来龙去脉,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着相通之处。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之间可以遵循互补原则。对历史资料的分析、综合,并非象《初论》所言属于历史学特有,历史社会学同样需要利用,而社会调查法也并不是《初论》讲的那样为历史社会学独占,其实历史学也常常采用,从中国古代《史记》的问世到当代美国口述史学、集体传记史学的研究,难道能离开社会调查吗?就连《初论》中特别强调的历史社会学两个“独特”研究方法——“比较法与如何继承法”——在历史学研究中更是普遍存在。至于《初论》认为历史社会学的资料“来源于现实的社会”,“它的落

① 柴宇球:《军事学·领导学·军事领导学》,《领导科学》,1927年,第7期。

② 《当代新学科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383、407页。

③ 徐平:《应该开展对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求是学刊》,1987年,第1期。

④ 刘茂才、张伟民主编:《科学学辞典》,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⑤ 满永谦:《应当建立历史科学学》,《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

脚点也还是要研究当今社会中的有关问题”的观点，事实上把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学混为一谈了。

### 三、何为“历史因素”

《初论》认为，历史因素就是指“以往人类社会的遗留物”，接着用大量篇幅就历史因素何以存在的基本原因及历史因素积淀的许多具体特点与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一分析颇有新意。但是，《初论》涉及的几个基本史实仍值得商榷。

1. 《初论》首先讲到：“历史因素积淀的厚度、力度与时间的推移成正比关系”，接着《初论》用中美两国历史比较对该标准加以论证：“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历史因素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诸方面形成了最大限度的积淀”，而美国历史很短，因而没有什么历史因素积淀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初论》在其标准之前特意加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定语：只有“在大工业社会之前”才如此。历史事实是，中华文明史长达五六千年，其中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实属“大工业社会之前”，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在封建残余束缚与帝国主义入侵的困境内艰难地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才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复杂而迫切的历史任务。<sup>①</sup>而短短200年的美国历史，经历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垄断阶段，又跨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时期，就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美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上半叶，内战后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促使“大工业社会”早日到来，形成西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高潮区，并与欧洲其他国家一起基本上完成了现今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并未中止）。诚然，比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对中美两国当然可以比较研究，但是对两个国情根本不同的国家能否用《初论》规定的同一标准衡量呢？《初论》中“在大工业社会之前”的限定，忽视了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历史条件，反倒束缚自己对两国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展开，而《初论》论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因素的作用固然是很大的，但自从近代以来历史因素对于社会的制约程度与社会的进步程度，可以说是成反比关系”后，又强调“在目前，历史因素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对社会起着制约作用”，似有矛盾之感。

2. 虽说《初论》也承认历史因素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重作用”，但《初论》对此却不能正确对待。第一，《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而再地强调，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历史因素“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历史惰性”，“严重地阻碍着我国的社会进步”。第二，《初论》在措词上笼统地列举“历史因素”的消极作用，而且对美国没有什么历史因素的论断也是为了证实这一论点。第三，《初论》阐述“中国非常需要历史社会学”的理由时，仅从痛恨历史因素在当今中国作怪的立场出发，我认为这不仅是对历史社会学的狭隘理解，也是对整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误解。就前者来讲，开展历史社会学研究，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是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况且其研究对象理应包括世界其他国家；就后者而言，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存的历史因素并非都起纯消极作用，“柏杨派”观点<sup>②</sup>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

3. 《初论》指出：“在美国谈不上有多少历史因素得以积淀下来，更谈不上雄厚的历

①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台湾学者柏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法是不妥的，其代表作有《丑陋的中国人》，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史因素对现实发生影响”。这也与史实不符。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后来居上的国家，由一个英属殖民地获得独立，并由后进地位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这一巨大变化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早期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殖民地时期北美社会政治结构在长期演变中逐渐出现的民主因素，<sup>①</sup>不仅有利于北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独立战争的胜利，而且作为积极的“历史因素”对以后200年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再就美国行政系统官制的发展演变进行深入探讨，也可以发现其中积淀着的一定厚度的“历史因素”，并对现代美国政治与经济发生作用。自殖民地时代以来形成的美国人具有创新意识、开拓精神、敢于冒险、勇于探索等民族性格至今仍在制约人们的行为。《初论》指出“美国人的血缘关系是很松懈的”，“美国人所受的各种人伦道德观念的限制要少一些”等现象，不正是200年积淀的“历史因素”在现实中的体现吗？至于美国历史传统中的消极因素更不乏见，并时刻腐蚀着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肌体。

4.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因素”呢？笔者以为，所谓“历史因素”乃是指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它有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两个方面，因此，不必要在夸大积极方面时否定历史因素的存在，而在痛斥消极方面时又罗列历史因素的种种丑态。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任何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具有一定继承性，“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sup>②</sup>在任何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都将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传统”与“现代”是现代化理论中一个极为混乱的概念，西方现代理论中的“传统”与“现代”划分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其实质是将“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充满着“西方化”色彩。我们说“传统”一般应理解为“由历史沿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等”<sup>③</sup>每一个民族在自身的历史活动中都创造了自己的传统，形成一定的“历史因素”，并具有这样的历史特点：第一，传统是非常复杂的一种结构，它包含着本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条件、由不同集团和个人所贡献的成份，其中还包括与外民族相互交流和影响的结果，因此很难讲哪一个民族的“历史因素”纯粹优劣。第二，虽然传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持久发生影响的“历史因素”也存在，但是任何民族的传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变化程度大小有区别，但都不断有新的成份加入并逐渐积淀，因此以固定模式对待一个民族“历史因素”的作法也是不可取的。

纵观世界各国近现代历史上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出，没有一个绝对继承传统、拥有全优“历史因素”的现代化过程，也没有一个完全拒绝传统、充斥消极“历史因素”的现代化进程。如果离开正确认识去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就不会顺利进行。因此，引进社会学的方法，开展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从史学角度研究中国国情和世界各国现代化运动的共性与特点，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些基础工作，就成为历史学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历史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王 颖

① 刘汴昌：《论北美殖民地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民主因素》，《文史哲》，1987年第3—4期。

②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76页。

③ 《辞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1页。